

发现“另一个传统”：玛乔瑞·帕洛夫的《诗学新解》及其他

罗良功

内容提要：玛乔瑞·帕洛夫的《诗学新解》（2013）提供了一个洞悉其诗歌批评理论的动态视角，其中涉及的帕洛夫与布鲁姆之间的诗学对话揭示了帕洛夫学术思想的微妙变化。两者论争的三个焦点，即审美批评、语言本体、现实关怀，构成了帕洛夫辨微阅读的核心，使她在批判地吸收新批评和文化批评的基础上形成独特的诗歌批评理论。借此帕洛夫不仅梳理了诗歌传统，而且还发现了一个与新批评所推崇的象征性诗歌传统并存的暗示性诗歌传统。

关键词：玛乔瑞·帕洛夫 辨微阅读 诗歌传统 新批评 文化批评

作者简介：罗良功，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英语诗歌和现当代英美文学。

Title Discover “the Other Tradition”: On Marjorie Perloff’s *Poetics in a New Key* and Others

Abstract Marjorie Perloff’s newly released *Poetics in a New Key* (2013) offers a dynamic perspective to her theory on poetic criticism. The book demonstrates some academic dialogue between Perloff and Harold Bloom over years, which reveals the subtle change in Perloff’s critical ideas. The focuses of the dialogue — aesthetic criticism, language as subject, and concern with reality — constitute the core value of Perloff’s “differential reading,” which witnesses her critical absorption of both New Criticism and Cultural Criticism and leads her to a discovery of “the other tradition” — the tradition of suggestive poetry neglected and rejected by New Criticism which devoted itself to the tradition of “symbolistic poetry.”

Key words Marjorie Perloff; differential reading; poetics tradition; New Criticism; Cultural Criticism

Author Luo Lianggong is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His research is mainly focused on English poetry and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American and British literature. Email: luogon2@yahoo.com

玛乔瑞·帕洛夫教授的新著《诗学新解》（2013）注定是一部个性鲜明、别有风趣的学术著作。与帕洛夫教授此前出版的十余部专著或专门主题的文集不同，这部由菲律宾德拉萨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诗学新解》，由帕洛夫教授十

余年来散刊于世界各地报刊的 15 篇学术访谈和 2 篇文学随笔集结而成，因而这部学术著作没有她在其他著作的严肃庄重，却充满灵动生气。她在序中说到这些访谈大多是即兴发挥，她本人也多已淡忘，但每一篇妙趣横生、旁征博引的文字，无不透着帕洛夫教授作为诗歌批评家和理论家的率真、严谨和执着，其中的每一处思辨、每一个观点，都具有清晰的指向性，与她一贯探讨的诗学问题相互映照、相互阐发。在这一意义上，这部著作虽然并非旨在呈现一个完整的知识结构或思想体系，但为研究帕洛夫教授的诗歌批评理论提供了动态的、多维的视角，为阅读帕洛夫教授的其他专著和专门主题的文集提供了补充。

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诗学新解》反映了帕洛夫与哈罗德·布鲁姆对话的进程。该书收录的一篇帕洛夫在 2008 年进行的谈话——“（解）建构另一种传统”——显示出帕洛夫对布鲁姆诗歌批评的态度转变，由此折射出她学术思想的变化与发展。帕洛夫教授一贯坚持审美批评、反对文化批评的诗学立场，这也是她与认同布鲁姆诗歌批评思想的一个共核。在女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文化唯物主义、新历史主义、非洲中心论等各种文化批评理论大行其道之际，布鲁姆力拒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化，强调知识与审美标准不可或缺，高扬其“审美自律性”的批评主张。1998 年，帕洛夫教授在《波士顿评论》（1998 年夏季刊）发表了关于布鲁姆编辑的《优中之优：1988-1997 年美国诗选》（*Best of the Best American Poetry, 1988-1997*, 1998）的书评，对布鲁姆反对文化批评、坚守美学立场的诗学原则给予肯定，但随后对布鲁姆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他过于强调主题阅读而忽视诗歌的语言本体、强调西方传统的“正典”地位而忽视了当下的创作实践，表达出对布鲁姆的研究路径、方法和基础的强烈不满。但是，在十年之后的访谈中，帕洛夫教授则对布鲁姆及其主题阅读给予了更多的肯定：“我的确比以前更喜欢布鲁姆的诗歌批评了，因为他毕竟关注的是文学性，而我们当前太多的学术批评基本上是凸显少数族裔、妇女、不同的民族等”（“(Un) Framing the Other Tradition” 116）。帕洛夫对布鲁姆给予更大的肯定，不仅是因为布鲁姆自身更加强调审美批评，而且也反映了她从学术史和学理上对布鲁姆“审美自律”主张的部分认同。布鲁姆诗歌批评的核心是主题阅读。他借此抛弃了新批评主张的“封闭式语言阅读”范式，将文学批评从文本之内重新引向文本之外，将文本和作家放置于一个更大的文学传统语境之中进行研究。帕洛夫尽管在 1998 年的书评中指责布鲁姆的主题批评没有关注诗歌形式等艺术要素，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审美（形式主义）批评向他自己反对的文化批评转变”也负有部分责任（“Visionary Company,” Web），但是在 2008 年的访谈中，她以阿什伯利为例肯定了布鲁姆的主题阅读：“将阿什伯利置于整个诗歌版图中加以研究的正是布鲁姆，这一点就不错”（“(Un) Framing the Other Tradition” 116）。由此不难看出，帕洛夫在 20 世纪后期和 21 世纪之初文化批评浪潮汹涌之时，对布鲁姆主题阅读表现出更积极的态度，反映了她更加坚定的审美批评立场。

然而，在《诗学新解》和其他著述中，帕洛夫从来都没有全盘肯定布鲁姆

的主题阅读范式。她认为“主题阅读是不错的，只是[……]有局限”（“(Un) Framing the Other Tradition” 116）。对于帕洛夫来说，布鲁姆主题阅读的局限在于他的批评理论在语言本体和现实关怀两个方面缺失。帕洛夫认为诗歌语言的物质性是审美批评的必由之路，而“处于布鲁姆诗歌批评核心的修辞心理学往往将我们带回到外在于诗歌语言物质性之外的主题”（“Visionary Company,” Web）。例如，他视阿什伯利的诗歌技巧为无关紧要之物，即便是对于他所钟爱的现代主义诗人史蒂文斯，他也拒绝关注其诗歌中的声音、节奏、句法，这“也使得他甚至没能铺平通向审美批评的道路”（“Visionary Company,” Web）。在这一点上，帕洛夫对布鲁姆的批评从来未曾撤销，而且以自己的诗歌批评实践与他对抗。

帕洛夫认为布鲁姆的诗歌批评缺乏现实关怀，主要因为布鲁姆忽视现当代诗歌、缺乏对诗歌与现实关系的关注。帕洛夫指责布鲁姆以浪漫主义作为唯一范式的理论前提，认为布鲁姆“以浪漫主义为唯一范式，使他无法参透一些当前创作的一些令人激动的诗歌”，他编辑的《1988-1997年美国诗选》将众多非常具有价值的当代诗歌特别是先锋诗歌被排斥在外（“Visionary Company,” Web）。在帕洛夫看来，布鲁姆试图以浪漫主义传统来建构当下的诗歌体系，明显忽视和压制了当下最具有活力和时代精神的诗歌作品，缺少现实关怀；而先锋诗歌——她有时称之为“形式激进的诗歌”——在现当代诗歌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诗歌批评不可回避的内容。同时，布鲁姆诗歌批评的核心在于修辞心理学而非语言和语言的物质性，其批评实践的重点是在诗歌版图中而非文化批评所主张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探讨诗歌，因而忽视了对现实社会的回应和关注。这正是帕洛夫认为布鲁姆的主题阅读的不足所在。

帕洛夫对布鲁姆忽视语言主体和现实关怀的持久批评恰恰反映了她本人对这两点的长期重视。这两点与她与布鲁姆共同奉行的审美批评一起，构成了帕洛夫诗歌批评的三个基本点，反映了她的诗歌批评理论与实践的独特路径。布鲁姆将盛行于20世纪中期的新批评派注重修辞与主题引出了文本之外，帕洛夫则在吸收新批评派强调文本研究的同时，将作品文本引向社会文化文本，将新批评的文本细读与文化批评结合，形成自己的诗歌批评方法，即“辨微阅读”（differential reading）。辨微阅读批判性地吸收了新批评和文化研究的优点，对20世纪以来美国影响最大的两种文学批评路径进行了纠正，具有文学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辨微阅读作为诗歌批评方法很早就在帕洛夫学术研究中得到运用，而在由她的15篇写于80年代的论文集结而成的《诗歌的破格特权》（1990）一书中得以完善，在2004年出版的专著《辨微：诗歌、诗学、教学》中给予了深入系统的理论阐述，《诗学新解》一书则通过访谈形式提供了更丰富的动态阐释。

帕洛夫认为，语言是诗歌的核心，也是诗歌与散文的区别所在，诗歌语言的物质性是审美批评的必由之路。她从叶芝、斯泰因、庞德的诗学观中找到了佐证。这三位成就巨大的诗人有着一个共同点，即叶芝所说的，“我们的语

汇一定要显得不可回避”，这的确是诗歌的关键所在（“Futurism and Schism” (2009) 140），因而诗歌批评必须面对语言，尤其是语言的物质性。因而，帕洛夫的辨微阅读拒绝从张力、象征、主题等固有的概念出发，直接面对语言所构建的绚丽文本。在这一点上，她与新批评和布鲁姆有着巨大差别。她承认诗歌“的确有所谓的‘技巧’——押韵、重复、首语重复、谐音、拟声、隐喻、转喻、双关、明喻，但是仅凭技巧难以成诗，认识到这一点的‘诗人’太少”；而“诗歌的内容和历来的形态”就在于“每一个表述都不只朝着一个方向”（“Alter(ed) Ground” 88），即她高度认可的伯恩斯坦诗歌语言所表现出的“两重性、三重性、四重性”，这正是诗意所在。因而，帕洛夫的辨微阅读强调语言在诗歌文本构建和诗歌意义建构中的中心地位，努力从语言的破格、语言的物质性呈现模式等方面去把握文本的文学性，探索语言产生的微妙的诗意。事实上，帕洛夫对于诗歌语言物质性的关注和强调贯穿了她的整个学术生涯，她早期有关弗兰卡·奥哈拉、罗伯特·洛威尔、约翰·阿什伯利等诗人的专题研究都强调对诗歌的语言包括声音和视觉等物质形态的诗学探讨，并逐渐引入和借鉴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和解构主义语言理论，强调对日常语言对常规语法和语言限制的突破所产生的诗性特征和诗性美的，注重语言的声音、视觉等物质性元素及其与物质世界的互文关系来发掘诗歌意义。例如，伯恩斯坦在2009年与帕洛夫谈话时说，帕洛夫在编辑《诗歌的声音 / 声音的诗歌》一书延续了她对于声音结构的重视，认为她“在整个生涯中从格律环境到后格律或非格律环境不断探索节奏和声音”（“Futurism and Schism” 139）。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诗学新解》中大多数访谈所揭示的一个事实：帕洛夫的诗歌批评始终重视诗歌的语言问题。

帕洛夫的辨微阅读强调诗歌批评的现实关注和当下价值，认为诗歌文本与诗歌之外的社会文化文本之间有着天然联系，而诗歌批评的现实关怀也应该通过面对语言来实现。她在《诗歌的破格特权》（1990）中指出，诗歌的破格特权与诗歌的历史和时代是分不开的，诗歌创新的基础是语言的拓展，其必然的发源地是活跃的城市和技术文化；在《未来主义：先锋艺术及其断裂的语言》（1986）中她系统讨论了先锋诗歌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先锋美学、极端政治、流行文化在语言上的交汇所形成的短暂而和谐的共融与渗透。她在与伯恩斯坦谈到在比利·柯林斯和戴娜·乔亚所代表的时代诗人该如何对待复杂的文化指涉的问题时，认为伯恩斯坦的诗歌就是“一种优秀的新的现实主义”，并称她为我们所在文化的“重要的编年史家”（“Futurism and Schism” 82），实际上肯定了伯恩斯坦在诗歌中以其高度的语言实验回应社会文化所反映出来的时代精神。帕洛夫这一批评立场的理论基础来源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和解构主义语言观，也被她所认可语言诗等先锋诗歌流派通过强调语言的能指功能来进行的诗歌实践所证明。在她看来，诗意在于诗歌语言的多重指向性，而后者正是语言的能指功能得以唤醒的结果，因而诗歌不是用语言来复现世界或者象征世界，而是以不确定指向的、充满歧义和多种可能性的语言来建构世界。即便诗人运用生活素材，一旦以语言形式进入诗歌便获得一种“此在性”（thisness），

其意义即变得开放。在这一意义上，诗歌文本是暗示性的而非再现性或象征性的。帕洛夫没有像新批评派那样将诗歌文本视为是自足的、封闭的、被现实规定的，而是视之为丰富的、开放的、不为现实左右的。因而，诗人不需要像艾略特那样使用注释，诗歌的阅读也不应局限于生活实际或读者的知识储备，因为这样会使得现实干扰诗歌的独立性，而且“读者不需要了解所有的指涉典故，[……]意义即可能较充分地显露出来。……这也是诗歌具有无穷的重读性的原因”（“Alter(ed) Ground” 88）；诗歌阅读应该实现个人化的、现实的生活向艺术世界的转变，以此反观现实生活。换言之，帕洛夫的辨微阅读是与诗歌的互动，是伯恩斯坦所说的“跳舞，两者跳着探戈”（“Alter(ed) Ground” 90），而不是两者的竞争，不是像新批评派那样对文本的操控，也不主张文化批评所奉行的意识形态介入。从根本上说，帕洛夫的辨微阅读反对意识形态主导或观念介入的诗歌批评，是希望将诗歌阅读引向语言本身及其与现实的对话，以此捍卫诗歌批评的审美性。

帕洛夫的辨微阅读是通过对新批评、文化批评等 20 世纪主流诗歌批评范式进行回应和反拨而形成的，但其目的并不在于对这些批评范式进行批判或评价，而是在于回到诗歌批评的本身、探寻诗歌这一特殊的艺术形式与人类生存状态的对话关系，在她的诗歌批评中促成了她发现了新的诗歌传统，即“另一种传统”（the other tradition）。这一表述本是阿什伯利在文章中的一个半戏谑性的表述，本身意义模糊、不确定，但是帕洛夫借用过来之后，就赋予它明确的内涵：它指的是与艾略特所关注的象征主义诗歌传统相对的“另一种传统”，“在这个传统中，语言立刻显得更强调字面意义、更神秘，无法被翻译或阐释”（“(Un) Framing the other Tradition” 111）；这一传统形成的诗歌强调语言的暗示和语言的突破，与新批评派所推崇的“再现性的、以易懂的方式表达情感的”那类“正确”诗相对应。帕洛夫从语言的审美性出发，对于从兰波、斯泰因、庞德、威廉姆斯、到大卫·安廷、约翰·凯奇等被新批评派排斥的诗人分别进行了研究，同时对虽已被新批评派关注但研究仍有大量偏颇和遗漏的诗人如叶芝和阿什伯利进行了考察，梳理出一个与“象征性诗歌”并行的传统，即“暗示性诗歌”传统。她的许多论著还通过论述大众传媒与诗歌语言和形式的关系，揭示了先锋诗歌的成长轨迹，确立了先锋诗歌在现当代诗坛的地位以及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帕洛夫对于“另一种传统”的梳理具有重要意义，不仅补充和纠正了主流批评话语由于认知缺陷和理论缺陷导致的重大遗漏和偏颇，确立了直抵审美本质、敏锐呼应时代的诗歌批评范式和标准，而且促进了人类对于艺术与生存关系的关注，彰显了强烈的人文情怀。她在专著《激进的策略：传媒时代的诗歌创作》（1991）中，现代传媒的兴起和社会的商业化是促进现当代先锋诗歌发展和流变的关键因素，揭示了诗歌与人类文明进程的互动关系，展现了她的诗歌批评对人类知识进步的人文关怀。由此，不难理解她对先锋诗歌推动人类知识发展的信心：“我坚信，一切将要发生的知识更新，都将来自于激进的诗歌/艺术社区”（“The Intellectual in the 21st Century” 225）。

Works Cited

- Perloff, Marjorie. "The Alter(ed) Ground of Poetry and Pedagogy." In *Poetics in a New Key*, 71-91.
- . "(Un)Framing the other Tradition: On Ashbery and Others (2008)." In *Poetics in a New Key*, 110-117.
- . "Futurism and Schism" (2009). In *Poetics in a New Key*, 131-144.
- . "The Intellectual in the 21st Century." In *Poetics in a New Key*, 222-225.
- . *Poetics in a New Key: Interviews and Essays*. Ed. David Jonathan Y. Bayot. Manila, Philippine: De La Salle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 2013.
- . "Visionary Company." In *Boston Review* Summer (1998). September 2010 <www.bostonreview.net/br23.3/contents.html>.

责任编辑：杨革新